

《白虎通》对训诂学的贡献

卢烈红

《白虎通》本为“通经释义”之作，在古代极受尊崇，但由于它宣扬的是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五四”以后，便不再为人所重，其训诂学价值长期得不到人们的正视，以至沉没不闻。本文从求综合、释礼制、训简称、存异说，用声训五个方面肯定了《白虎通》对训诂学的贡献，力图纠正人们对此书认识的偏颇，促使人们注意它，研究它，使它得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白虎通》又名《白虎通义》、《白虎通德论》^①，它是班固奉汉章帝之命，对建初四年（公元79年）白虎观经学会议的讨论结果加以总结整理而写成的一部著作。

《白虎通》是经学和谶纬神学合流的产物。它以天神为核心，以阴阳为经、五行为纬，纳入全部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构筑了庞大的神学思想体系，建立了封建统治思想的完备形态，不仅成为东汉一代的“国宪”，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近两千年。它是一部哲学著作，尽管它的作用和影响多是负面的，但它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否认的。

《白虎通》又是一部训诂著作。东汉著名学者蔡邕曾说：“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②蔡邕以“通经释义”四字概括白虎观经学会议的内容，实际上也就点明了《白虎通》一书的性质。近代国学大师黄侃先生亦把《白虎通》视为“说经之书”，其《礼学略说》云：“汉以来说经之书，简要明哲者，殆无过《白虎通德论》。”^③实际情况确是这样。《白虎通》尽管可算作一部哲学著作，但它并不象其它哲学著作那样以说理文的方式直接阐述哲学观点，它的哲学思想是在通经释义的过程中间接表现出来的，因此，确切地说，它首先是一部训诂著作。在内容上，它对群经所涉及到的礼制及有关字词进行训解阐释，不仅释其然，而且释其所以然，并将后者作为侧重点。在形式上，它仿效《公羊传》《谷梁传》，采用自问自答的训释格式，但它并不象《公羊》《谷梁》那样随文释义，而是通释群经，独立成书，用训释之语构成正文，属正文训诂的范畴。

由于《白虎通》神学色彩浓厚，过去一段时间，哲学界对它不甚重视，这种情况近年来已大为改变，一些哲学史著作开始辟专章讨论它。在“五四”以后的训诂学界，这本书也长期受冷落，而且这种状况还在延续。迄今为至，没有一篇论文从语言学角度探讨它，一些语言学史、训诂学史著作或仅征引它的个别材料作否定声训的根据，或对整部书一笔带过，作出否定的评价，或者干脆只字不提。它几乎可说是语言学的弃子。我们认为，从训诂学角度看，《白虎通》确实存在不少错误，但作为在《说文》《释名》之前出现的一部重要的“通经释义”之作，它对训诂学并非毫无贡献，不对它进行研究，一方面不利于考见汉代训诂学发展流变的轨迹，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今天批判地继承、辩证地利用这份文化遗产。有鉴于此，本文尝试

从五个方面就《白虎通》对训诂学的贡献作初步的分析探讨，希望能改变训诂学界对它的看法，促进对它的研究，使它得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求 综 合

汉代自古文经被陆续发现后，逐渐产生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分野，两派之间展开了长期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截至白虎观经学会议召开之前，两派之间的论争已进行过三次。在西汉以迄东汉初年的长时期内，今文经学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对古文经学不遗余力地进行排斥打击，这派经师“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④，严重阻碍了学术的发展。《白虎通》在今文经学仍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适应新的形势，打破今古文经学尖锐对垒的局面，以今文经学为主，积极吸收古文经学，表现出求综合的倾向，为东汉后期综合学派的最终形成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白虎通》具有求综合的倾向，这是由白虎观经学会议的宗旨、会议的主持人和参加者、书的编撰人等因素决定的。据《后汉书·杨终传》《章帝纪》，白虎观经学会议是汉章帝接受杨终的建议下诏召开的，其内容是讲论五经同异，目的是在董仲舒依据今文经学确立的封建统治思想受到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的巨大冲击之后，在今古文经学长期不断交锋的形势面前，通过弥合今古文经学的纷争，在两者之间寻找共同点，重建“永为后世则”的封建统治思想。很明显，这必然会给《白虎通》带来混融今古文经学的色彩。这次会议的主持人是汉章帝。史称章帝“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即位之初，即令贾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⑤逮至建初八年，又下诏“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⑥由这样一位酷爱并着意扶持古文经学的帝王主持会议，“亲称制临决”^⑦，这就使得会议能在以今文经学为主的前提下，对古文经学兼收并蓄，从而使《白虎通》呈现出不守门户之见的新面貌。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也不限一派，既有今文经学家，也有古文经学家。在现在能考见的13人中，确知属今文学派的有魏应、楼望、李育、鲁恭、召驯、桓郁、丁鸿、张酺，属古文学派的有贾逵、班固。古文学家数量虽居少，但贾逵深得章帝的宠信优待，在会议中起的作用肯定不会小。与会学者的这些情况也是使《白虎通》具有综合倾向的因素之一。班固属古文学派。《后汉书·卢植传》说他“敦悦”“古文科斗”，本传又说他“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实际上，他是一位兼通今文经学的古文经学家。毫无疑问，由他奉旨撰集《白虎通》，虽然还不足以动摇今文经学在当时还顽强占据的统治地位，但将古文经学推上大雅之堂，打破今文经学的一统天下，乃情理中事。

《白虎通》摆脱学派偏见、趋向综合首先表现在内容观点上。本书的通例是先解释说明字词礼制，然后引典籍加以印证，解释说明与所引典籍是一致的，因此，从它征引哪种性质的典籍，就可看出它是采用哪一学派的观点。综观全书，所征引的不仅有今文经，也有古文经。在被征引的古文经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古文经学核心著作的《周官》。《爵篇》：“或曰：冢宰视卿，《周官》所云也。”《社稷篇》：“社稷所以有树何？尊而识之也，使民人望见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徒班社而树之，各以土地所宜。’”征引过《周官》的篇目还有《耕桑篇》、《著龟篇》、《嫁娶篇》、《丧服篇》。从全书看，在所征引的典籍中，能确指为古文经的，所占比重并不大，但征引《周官》，其意义却不小。《周官》在汉初搜求书籍时，得之偏晚，武帝把它视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⑧，束之高阁，秘而不传。到西汉末，古文学家刘歆“奏请《周官》六篇列之于经为《周礼》”^⑨，“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⑩一直受今

文学家强烈排斥的《周官》，能作为征引对象，最能表明对二派的兼容并蓄。

《白虎通》趋综合的倾向同样表现在注释作风上。今古文经学不仅在思想观点上有分歧，在注释作风上也有区别。今文经学致力阐发微言大义，疏于字词训释，有时不免脱离字义凭空臆说，其末流且有烦琐之弊。古文经学以字词名物的训释为主，注重按字义讲解经文，提倡务实的态度，训诂简明。《白虎通》能吸收这两种做法的优点，一方面重视对各种礼制之所以设立的本意及其作用加以阐释，另一方面又注意对字词的意义进行探求，把说明“大义”和训释字词结合起来，行文亦要约明畅。如《衣裳篇》：“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絺纁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所以名为衣裳何^①？衣者隐也，裳者障也，所以隐形自障闭也。”这段话先言衣服原初的生物学意义和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社会学意义，然后根据衣服初始的“蔽形”作用，推究了“衣”“裳”二词得名的由来。又如《嫁娶篇》：“天子之妃谓之后何？后者，君也。天子妃至尊，故谓后也，明配至尊，为海内小君，天下尊之，故系王言之曰王后也。”此条释“后”为“君”，在此基础上说明天子之妃称“后”的原因。二例皆释大义与训字词并重。

《白虎通》在以今文经学为主的同时，吸收古文经学，弥合两派的缝隙，思想观点上能兼收并蓄，学术作风上能博采众长，这就为汉代综合学派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及至郑玄出，在广阔的范围内超越今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括囊大典，网罗众家”^②，建立了标志综合学派最终形成的“郑学”，给今古文学派长期的纷争打上了一个句号，写下了经学史、训诂学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

二、释礼制

训诂虽以词义训释为核心，但并不局限于此，它的范围很广泛，在言语理解的过程中，凡是需要解释的东西，就都是训诂不能回避的对象。著名学者张世禄先生早就指出，训诂学“与其说是字义学，不如说它是解释学。”^③由于典章制度是人们阅读古代典籍时的障碍之一，不懂古制有时比不懂字词更影响理解，因此古代的训诂著作都注重讲解典章制度。《白虎通》的主要内容就是释礼制，它将各方面的礼仪制度汇聚于一册之内，加以集中系统的阐释说明，在这方面，它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色。

其一，深。《白虎通》不仅展示了各种礼仪制度的具体内容，而且深入其中，致力阐释它们制定的本旨、具有的意义和能发挥的作用，即不仅释其然，而且释其所以然，这就使人们能对每一礼仪形式、每一具体制度由表及里，获得深入的理解。如《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④；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阴阳中和之气而用尤多，故为长也。岁再祭之何？春求秋报之义也。……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这三问三答，不仅点出古代每年祭祀土神谷神的次数以及祭品的规格，而且十分准确透彻地阐释了古代立社为土神、以稷为谷神，每年以高规格祭品祭两次的原因和目的。《诗经》有《载芟》《良耜》二篇，据《诗序》，这两篇的主旨一是“春籍田而祈社稷也”，一是“秋报社稷也”。春天祭社稷，是为了求神降福，保佑农业丰收；秋天祭社稷，是为了向神报告成功，报答神的恩德。“求福报功”四字是对这一祭祀制度精神实质的精炼概括。

其二，全。《白虎通》在阐释某项礼仪制度时，必对该项礼仪制度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各种情况包括变异情况进行全面的介绍说明，使人能对该项礼制获得全面完整的了解。如《嫁娶篇》阐释的是婚姻嫁娶礼制，它能充分体现本书“全”的特色。此篇首释“人道所以有嫁娶”的原因，指出“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伦之始，莫若夫妇”，嫁娶的意义

在于“重人伦，广继嗣”；次释男娶女嫁皆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因；次释男女婚嫁的年龄，对年龄方面男大于女的普遍现象作出解释；次释从订婚到结婚整个过程中一系列的 具体仪式、所用的礼物、男女两家的应对之辞；次释嫁娶为何必在春季；次释妻子能否主动离婚；次释天子诸侯的嫡媵制度；次释娶妻时为何要占卜；次释人君和宗子在父母双亡的情况下为何能自己决定婚姻大事；次释大夫在立功受封后“得备八妾”，但不得弃原妻而改娶大国之女为嫡；次释天子太子、诸侯世子“皆以诸侯礼娶”；次释天子诸侯选择配偶的范围；次释天子与诸侯嫁女时由谁主婚；次释卿、大夫、士的妻妾配置情况；次释嫡妻死后，空出之位如何安排；次释订婚后、结婚前如遇男方或女方父母逝世的情况该如何处理；次释妇人必有师傅及所学内容；次释男子不能娶为妻的五种人及休妻的礼仪；次释王后、夫人、妻、妾、嫁、娶、男、女、夫、妇、婚、姻等名称得名的由来；最后释夫妻中止性生活的年龄。全篇涵盖了婚姻制度关涉的各个方面，对各种变异情况下的处置方法也加以说明，展示了古代婚姻制度的全貌。

其三，广。《白虎通》阐释礼制并不局限于窄小的范围，而是涉足广阔的领域，将政治、军事、法律、祭祀、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有关礼仪制度揽入自己的视野，一一加以考察说明。只要将今本四十三篇作一粗略分类，即不难明了这一问题。《爵》《谥》《封公侯》《王者不臣》诸篇阐释分封赐爵赐谥制度以及官员的结构体系；《巡狩》《考黜》阐释官吏的考核奖惩制度；《致仕》阐释官员的退休制度；《瑞贄》阐释朝觐制度；《谏诤》阐释谏诤制度；《三军》《诛伐》阐释军事制度；《五刑》阐释刑罚制度；《耕桑》阐释天子王后亲耕、亲桑制度；《五祀》《社稷》《蓍龟》《封禪》阐释祭祀制度及卜筮礼仪；《三正》《日月》涉及历法；《礼乐》阐释礼乐制度；《乡射》阐释射礼、乡饮酒礼；《辟雍》《三教》《三纲六纪》阐释教育制度，包括学校教育和对社会一般成员的思想教化；《宗族》阐释宗法制度；《姓名》阐释姓氏制度；《嫁娶》阐释婚姻嫁娶的礼仪制度；《丧服》《崩薨》阐释丧葬礼仪。凡是出现在古代典籍和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礼仪制度，在这里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白虎通》释礼制有深、全、广三大特点，因此不论过去还是今天，它对人们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国古代各种礼制，深刻理解各种礼制的精神，真正读懂古籍，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训 简 称

简称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同其它语言单位比较，它有着更强的时代性，不经过专门解释，后人往往茫然不知所云。但遗憾的是，我国古代通释语义的字典辞书，由于主要以字词为收录单位，囿于体例，对带词组性质的简称不收或很少收录，而随文释义的注疏虽注简称，却又散见各书，零零星星。《白虎通》能对简称予以足够的注意，将各书中出现的简称汇辑于一书之内，精心训解，为加强训诂学中的这一薄弱环节作出了贡献。

《白虎通》收释的简称数量较多。汉代著名的三部辞书，《说文》《释名》只偶尔释及简称，《尔雅》虽说收录一些，但数量极少，仅十来条。《白虎通》所收的简称，除开庄述祖所辑《白虎通阙文》不计，也有近40个。为便于读者今后查阅利用，今依出现顺序开列于此：五爵、三爵、三从、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五祀、三牲、两社、五声、八音、三光、三形、三尊、五行、五谏、五岳、四渎、九锡、八风、五瑞、三正、三微、三教、三纲、六纪、五性、六情、五脏、六府、三命、五宗、九族、四时、五刑、五经、四礼、五不娶。

《白虎通》对简称的训释都很精当。试将它们与今天权威性辞书《辞海》（1979版）的相同条目作一对比，就不难看出它们的科学性。它们与今《辞海》的关系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

(1) 为今《辞海》直接引用，以作为建立义项的根据，有时还径以代替具体的条列。如《封公侯篇》：“天有三光，日月星。”今《辞海》“三光”条第一个义项曰：“指日、月、星。”后即引此文为证据。《瑞贄篇》：“何谓五瑞？谓珪、璧、琮、璜、璋也。”今《辞海·增补本》“五瑞”条义项二曰：“五种瑞玉。”后即引此文具体说明是哪五种。(2) 今《辞海》虽未录其原文，但在说法上与之一致。如《情性篇》：“六府者何谓也？谓大肠、小肠、胃、膀胱、三焦、胆也。”今《辞海》“六府”条说法与此同。(3) 被今《辞海》列为异说。《宗族篇》：“族所以九者何？九之为言究也。亲疏恩爱究竟，谓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今《辞海》将高祖下至玄孙九代作为“九族”的正解，又把“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为‘九族’”作为另一说收列。(4) 能纠正今《辞海》的偏差。《三正篇》引《尚书大传》说明何为三正：“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并特别强调说：“不言正日言正月何也？积日成月，物随月而变，故据物为正也。”“三正”是指夏、商、周三代以不同的月份为正月，它是以月份为单位，就整个正月定在哪一月而言的，本与日无关。但今《辞海》“三正”条说：“我国古代的历法有以建子、建丑、建寅三个月的朔日为岁首的，依次叫周正、殷正、夏正，合称为‘三正’。”将朔日牵扯进来，不符合“三正”的得名之由，似是而非。

《白虎通》在采录、训释简称方面作出的成绩，在这方面的工 作十分薄弱的古代，特别显得可贵，直到今天，我们阅读古籍，编撰辞书，还能利用这些成果，获得不少帮助。

四、存异说

《白虎通》在通经释义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收罗了不少异说。班固自己在《礼乐篇》中对这样做的动机作了说明：“问曰：异说并行，则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吾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志之也，知之次也。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天之将丧斯文也，乐亦在其中矣。圣人之道，犹有文质，所以拟其说，述所闻者，亦各传其所受而已。”作者尊重与会者各家“所受”的不同师说，在择善而从的前提下，兼采并存，以求博闻多见，这种做法是与前面谈到的求综合的倾向相联系的，藉此保存下来的异说材料，确能广见闻，备参考，于学术研究大有裨益。

《白虎通》存录的异说，具体说来，有三种情况：一是关于语词的，一是关于礼制内容的，一是关于礼制精神的。现分述如下：

1. 关于语词者

关于语词的异说，多表现为对简称具体指谓的不同训解。典型的例子是“五霸”。《号篇》列出了关于“五霸”的三种不同说法：“五霸者何谓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也。……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也。……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也。”今人一般只知有后两种说法，此条使我们得知关于“五霸”除今天通行的两种说法以外，还有另一种说法，并且这种说法恰恰是古代最通行的。

语词方面的异说，有些是关于事物名称得名由来的不同解释。如《礼乐篇》：“何以名为夷蛮？曰：圣人本不治外国，非为制名也，因其国名而言之耳。一说曰：名其短而为之制名也。夷者，傅夷无礼义，东方者少阳易化，故取名也；蛮者，执心违邪；戎者，强恶也；狄者，易也，辟易无别也，北方太阴鄙鄙，故少难化。”此段释夷、蛮、戎、狄这四个族名得名之由，正解认为它们是由国名移植而来，异说则认为它们是分别根据这些民族的缺点而定，虽皆未可视作定论，却都可以聊备一说。

2. 关于礼制内容者

关于古代礼制的具体内容，各家间有不同说法。本书在这方面也是以一说为主，兼存异说。如《五祀篇》谈到祭门、户、井、灶、中霤五种神祇所用的牲畜时，先言：“祭五祀，天子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这是说，五祀所用牲视祭者的地位身份而定。紧接这种说法之后，作者列出异说：“一说，户以羊，灶以鸡，中霤以豚，门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不得用牛者用豚，并以鱼。”这里是异说中又套有异说，二说的共同点是：五祀所用牲视所祭的对象而定。又如《嫁娶篇》谈到人君嫡妻死后是否更立的问题，列出了两种说法：“嫡夫人死后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贱承宗庙，自立其娣者，尊大国也。……或曰：嫡死不复更立，明嫡无二，防篡煞也。祭宗庙，摄而已。”“或曰”引出的异说，与前一说恰相反。

3. 关于礼制精神者

对于同一项礼仪制度或其中的某一细节，其制定的本意，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各家的看法也有差异，作出的阐释不尽相同。本书对这方面有价值的异说亦予采录，如《考黜篇》在叙述天子对诸侯定时考核以定黜陟的制度时，谈到对考核不合格者的处理方法是先削地，后黜爵。为什么要按这样的次序处罚呢？篇中说：“爵者，尊号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广土众民，故先削其土地也。”这是一种解释。篇中又列出异说：“或曰：恶人贪狼重土，故先削其所重以惧之也。”此说也不无道理，有一定参考价值。

五、用 声 训

《白虎通》的字词训诂，主要是采用声训方式。据粗略统计，全书有声训三百条以上，占全部字词训诂的百分之八九十。受整部书神学思想体系的支配，这些声训较多地与阴阳五行学说发生了联系，不少训释穿凿附会，与汉代其它训诂著作中的声训相比，可信者所占比例显然偏低。但是，《白虎通》的声训并非条条皆错、毫无价值，从宏观上看，它们在训诂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从微观上看，它们有多方面的具体贡献；近几十年来训诂学界对它们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是有失偏颇的。

从宏观上看，《白虎通》的声训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由先秦正文训诂中零星的声训，到这里大规模集中地使用声训，表明人们对词语相互之间音义关系的认识已由模糊趋向明朗，由自发趋向自觉。《白虎通》几乎凡事都以声训的方式穷究其得名之由，可以肯定，作者已认识到事物的命名，有它的参照物，词语之间在音与义两方面都有相承关系。这种认识显然符合词汇在初步形成之后进一步发展时所遵循的客观规律，标志着人们对语言特征的把握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其二，《白虎通》大规模集中地使用声训，对汉代声训的兴盛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本书出现在《说文解字》、郑玄注、《释名》之前。《说文解字》和郑玄注较多地使用声训显然受到它的影响，一些字词的训释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而《释名》的出现，更与它的启发分不开，《释名》的作者刘熙正是在它大量集中用声训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用声训、求语源的专著，在训诂学史上竖起了第一块声训的里程碑。

从微观上看，《白虎通》声训并非都是妄逞臆说，有一定数量的声训符合语言实际，或至少包含这样或那样的正确因素，它们对语源学、语义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1. 科学地阐明了部分双音词的理据

所谓词的理据，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事物的得名之由。《白虎通》以声训的方式推究词的理据，其中双音词占有一定比重。今天看来，这些以双音词为对象的声训大多数缺乏科学性，但有一部分对所释双音词的理据作出了正确说明，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例如《爵篇》曰：“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此

以“天之子”释“天子”，一语中的。“天子”一词确为君权神授观念的产物，称帝王为“天子”就是说：帝王是上天的儿子，他在人间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合法的，他的威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对他必须诚惶诚恐，顶礼膜拜。

又如“倚庐”是古人守丧时住的简陋房屋，为什么称之为“倚庐”呢？《丧服篇》曰：“所以必居倚庐何？孝子哀，不欲闻人之声，又不欲居故处，居中门之外，倚木为庐，质反古也。”这里暗用声训，以“倚木为庐”解释“倚庐”得名的由来。《仪礼·既夕礼》“居倚庐”。贾公彦疏曰：“以倚东壁为庐，一头至地。”宋代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引唐代杨垂《丧服图》云：“凡起庐，先以一木横于墙下，去墙五尺，卧于地为楣，即立五椽于上，斜倚东墉，……庐形如偏屋。”原来，倚庐是在中门外、大门内的东面墙壁处，以木料斜靠在墙上搭制而成的三角形棚屋，由于它是以木倚（靠）于墙壁而为庐，故名“倚庐”。《白虎通》的解说正确揭示了“倚庐”的理据，使我们仅凭“倚木为庐”四字就能粗略地了解到它的搭制情况。

2. 成功地系联了不少同源词

《白虎通》的不少声训，正确揭示了词语间的音义联系，释词和被释词确实是同源词。如《五行篇》：“冬之为言终也。”“终”是终了、完结，“冬”是一年最后一个季节，是一年的终了，二字端照准双声，冬部叠韵，实同源。又如《三教篇》：“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效”是效法、仿效，“教”是教育、教导，其目的是要受教育者仿效，照着去做。《诗经·小雅·角弓》说：“尔之教矣，民胥效矣。”“教”“效”二字见匣旁纽，宵部叠韵，实同源。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白虎通》声训系联同源词，有些不仅系联正确，而且科学揭示了同源词的先后关系，其被释词确实是释词的派生词。《嫁娶篇》：“嫁者，家也，妇人外成，以出适人为家。”王力先生指出：“古人以为妇女出嫁才算有家，故‘嫁’‘家’同源。”^⑩从概念产生的顺序看，必须有“家”才可能有“嫁”，故“家”为源词，“嫁”由其派生。

3. 释词与被释词并不同源，但具体训释中包含某些正确因素

《白虎通》的有些声训，并未在同源词的系联上获得成功，释词与被释词并不存在同源关系，但释词后的具体训释中却含有某些正确因素，揭示了被释词的某些意义特征。如《礼乐篇》：“音者饮也，言其刚柔清浊，和而相饮也。”古代作为音乐术语的“声”与“音”是有区别的，《礼记·乐记》曰：“声成文谓之音。”可见“音”的特点在于它须由各种乐声配合而成。此处以“饮”释“音”，“饮”肯定不会是“音”的同源词，但“和而相饮”表明有多种乐声参与配合，道出了“音”的特点。

由上可见，《白虎通》确实对训诂学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我们今天阅读古籍，研究语文学、语源学，还能从书中获得不少益处。希望学术界能进一步研究《白虎通》，并将研究的视野扩大到同类书籍，从而推动训诂学的发展。

注 释：

- ① 本文采用的是商务印书馆 1936 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白虎通》。
- ② 《后汉书·蔡邕传》
- ③ 《黄侃论学杂著》第 460 页。
- ④ 引文并见刘歆的《让太常博士书》。
- ⑤ 参见《后汉书·贾逵传》。
- ⑥⑦ 《后汉书·章帝纪》。

⑧⑩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

⑨ 荀悦：《汉纪》。

⑪ “裳”上原无“衣”字，依例当补。

⑫ 《后汉书·郑玄传》。

⑬ 张世禄：《训诂学与文法学》，载《学术》1940 年第 3 辑。

⑭ “尊”原作“也”，据元大德本改。

⑮ 见《同源字典》第 127—128 页。

（本文责任编辑 张炳焯）